



学海堂书院学长制研究

朱华伟, 李承先

(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浙江金华 321000)

摘要: 阮元 1820 年在广州设立的著名书院学海堂, 在近代书院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出于传统书院山长制式微和发展经学的缘故, 阮元在学海堂实行了独特的教学管理制度——学长制。学长制的具体程式与职责是季课考察、指导生徒学术修为、举行雅集活动、综理书院事务和参与教学。学海堂前后存续了近百余年, 培育了大批学人, 促进了教育模式的地域流转。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之中, 学长制成为中国传播“宪政”思想的媒介,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学管理走向民主与科学。探究学长制可为当代研究生导师制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阮元; 学海堂; 学长制; 导师制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2-0082-08

Study on the senior system of Xuehaitang college

ZHU Huawei, LI Chengxian

(Tian Jiab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0, China)

Abstract: The well-known Xuehaitang College established in 1820 by Ruan Yuan in Guangzhou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olleges. Due to the reasons of traditional Shanchang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Ruan Yuan implemented a unique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Xuehaitang College, named “the senior system”. The specific form and duties of the senior system were to test students quarterly, to guide students in academic studies, to hold literati gathering activity, and to comprehensively study the college and participate in teaching. Xuehaitang College existed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had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and promoted regional circulation of education mod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e senior system became the medium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China, and made the university management move toward democracy and science in a certain process. Exploring the senior system can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graduate tutor system.

Key words: Ruan Yuan; Xuehaitang; senior system; tutor system

阮元, 字伯元, 江苏仪征人, 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在广州城北粤秀山创办了学海堂书院。随着传统书院山长制式微, 加之发展经学的需要, 阮元在学海堂实行了独特的教学管理制度——学长制。“学长”即主管学习事务的人, 最早出现于《能改

斋曼录》:“乃命耆为学长, 张景宗观察为副学长。”^[1]学长制和汉代太学的“次第相授”(由高业弟子向低业弟子传授知识)有异曲同工之处。学长制作为学海堂书院的教育管理制度, 其本质与传统书院山长制相对立, 它属于集体领导, 体现的是分权与制衡机

收稿日期: 2018-09-14 网络出版日期: 2018-12-28

作者简介: 朱华伟(1989—), 男, 河南淮阳人, 硕士研究生, 从事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 李承先, E-mail: Lxc@zjnu.com

制,强调分工与协作结合,递增教学管理成效。山长制实行的是独裁管理机制,事权归属山长一人,对其学识道德要求甚严,一旦山长良莠不齐,势必影响书院教学与学术声誉,为世人所诟病。目前,学界对学海堂研究多集中于其经学教育。翁筱曼^[2]认为学海堂教学以经学考据、辞赋诗词为主,不习“八股文”。於梅舫^[3]认为传统书院在“官学化”的道路上执拗于僵化无用的科举制度,而学海堂转向“实学”的考据治学范式,意在扭转前者的学术偏向,重塑士子的德行睿智。学海堂经学教育在树立儒学话语权力的同时,也是对明清以来程朱理学理念在学术上大一统的对抗,这种对抗是建立在自汉代以来文物词章等“实学”的复兴。董铁柱^[4]认为阮元不仅是汉学大家,而且也是为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学者与政治家二元一体的身份,使其肩负着兴学育才与为官从政的双重职责,创办学海堂不仅可以教化一方,更是德政体现。从上述既有研究成果可知,学界对学海堂的文化教育及学海堂创立动因分析鞭辟入理。但是,学界对学海堂内部组织结构,特别是对阮元实行“学长制”管理模式的研究较为罕见。故此,笔者试对学长制设立缘起、学长具体职责、学长制的影响及其对当前研究生教育的启示,进行探微溯源,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实施学长制的缘起

(一)传统书院山长制式微

山长是唐朝至清末传统书院的负责人,负责书院教学与日常管理,其个人学识品行关乎书院兴衰成败。文翁兴学大变蜀地民风,苏胡教法名噪一时,皆得益于山长的学识与担当。清廷对书院山长的人选问题颇为重视,深感德才兼备之人的难选。“若一人教授,即能化导多人俱为端人正士,则此一人之才德既可以膺辅弼之任,受封疆之余。此等人,岂可易得?”^[5]清末,山长制已经腐败不堪,不足以承担兴学育人的重担,改革书院管理体制亟不可待。书院“为郡县者攘为己有,且各请院长以主之。所谓院长,或为中朝所荐,或为上司属意,不问其人学行,贸贸然奉以为师,多有庸恶陋劣,素无学问,窜入其中,往往家居而遥领之,利其廪给,以供糊口。甚者诸生有经年而不得见,见而未奉教一言,经史子集,诗赋古文之旨茫茫无所解。”^[6]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7]¹¹²⁴,对

书院选聘山长用人不当早有耳闻,深知书院山长制积弊丛生,“原以山长为多士观摩,若徒视为具文,漫无考核,即无以为激劝之资,则日久因循,未免怠于训课,惟知恋栈优游,诸生或且习而生远,恐于教学无裨。”^[8]因此,他规定学海堂“永不立山长,亦不允荐山长”^[9]。

(二)发展经学的需要

清廷自乾隆起闭关锁国,只在地处海疆的广州设立“十三行”与国外进行商贸往来,故当时广州的经济发展优于江浙一带。但是,19世纪的广州仍处于文化的边缘,未进入主流文化圈。“广南人士,不如江浙,盖以边省少所师承,其藏书至万卷者,更屈指可数。故州郡书院,止以制艺试帖与诸生,衡得失而士子习经,亦但取其有涉制艺者,简练以为揣摩,积习相沿,几于牢不可破。”^[10]²⁷⁹广州的士人学子仍醉心于科举制文,并且“濡染阳明绪余,祖法乎良知之说,与康成晦庵相违,视六经为支离,薄训诂研索为末务。士子稍解握管,辄高谈妙论,凡目所未见之书,辄指为伪册,父诫其子,师训其徒,牢不可破,空疏无据,流弊三百年”^[10]²⁷⁶。为扭转轻视经学文风,树立实学在广州的学术地位,学海堂自成立起以“专勉实学”为宗旨,由阮元亲自授课,向学生讲经析疑,“凡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思与诸生求其程,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途。”^[10]²⁷¹因此,从阮元为学海堂立下的学术宗旨可以看出,学海堂不待举业,专攻经学。但是,学海堂诸生学习范围远远超出科举应试内容。“昔者何邵公(何休)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与康成并举。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见主名。士多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家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和《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11]故此,学海堂在选举学长时,要求学长在经学方面必须学有专攻、各有所长,能够有效指导学生多领域治学。“学长责任与山长无异,惟此课兼该众体,不能独理,故必八学长,协力启导,庶几人才日起”^[12],并“设经古之课,不专一题,俾得所近,不速其期,俾尽所长”^[17]²⁵,学长要各有所长,互相补足。吴兰修等人作为学海堂首任八位学长,虽在官场称不上佼佼者,但在经学、金石书画等方面确有建树。从表1学海堂八学长简况中的学术成就^[13],可知其在“实学”上的造诣与修为。

表1 学海堂八学长简况

学长	籍贯	为政经历	学术成就
吴兰修	广东嘉应	官至信宜县训导,曾出任粤秀书院监课	刊刻过《岭南丛书》,著有《端溪砚史》《桐华阁词》《南汉记》《宋史地理志补正》《荔村吟草》《学海堂集》《学海堂丛刊》《南汉金石志》《吴兰修词选》
熊景星	广东南海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举人,官至开建县训导	著有《吉祥溪馆诗集》《题画诗》等
马福安	广东顺德	道光九年(1829年)中进士,后改庶吉士,散馆后分别在四川犍为、福建顺昌、诏安、漳浦等地任县令,累官至安徽省六安州知州	撰有《鉴古经世编》《明代名臣传赞》《止斋文钞》《贞冬诗存》等
林伯桐	广东番禺	嘉庆六年(1801年)举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选授肇庆州学正	著有《修本堂稿》《粤风》《两粤水经注》《古谚笺》《供翼小言》《史举蠹测》《毛诗通考》《左传风俗》等
吴应逵	广东鹤山	乾隆六十年(1795年)举人	著有《雁山诗文集》《谱荔轩笔记》《岭南荔支谱》《鹤山县志》等
赵均	广东顺德	嘉庆十三年(1808年)副贡,仕历学正	均有干才,明算数,以开方法测量皆准,著有《自鸣轩吟草》
徐荣	广东广州	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以知县分发浙江,历官遂昌、嘉兴、临安诸县,后升绍兴知府,调至杭州,署杭嘉湖道,以清廉著称	著有《大戴礼补注》《梅统》《日新要录》《怀古田舍诗节抄》等
曾钊	广东南海	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生,官合浦县教谕,调钦州学正	《周礼注疏小笺》《二十部古韵》《诗说》《论语述解》《读书杂记》《异物志》《面城楼文存》《面城楼集》

八学长中,吴兰修独好文史,治学严谨,工诗文,擅算学,精考据,自称经学博士。曾钊在“仪徵阮元督粤,震泽任兆麟见钊所校《字林》,以告元,元惊异,延请课子;后开学海堂,以古学造士,特命钊为学长,奖励后进”^{[7]1522}。林伯桐“于诸经无不通,尤深于毛诗”^{[7]1524}。学海堂八学长在经学方面的学术功力相当深厚,能够得到学术大家阮元称赞,亦非泛泛之辈,在当时岭南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学海堂季课,应课学生数量多,需要更多学术、管理双兼型教师。”^{[14]26}学海堂实行季课,一年四次考试,但是规模甚大。据《学海堂丁亥课士录》载,考试结束后学海堂会对学生进行奖励,“经史取七名,次取八名。又次取四十六名。诗赋上取六名,次取十名,又次取七十七名”^[15],奖励学生共计154名,可推知参加课试生徒的人数更多,如此大规模的考试若单靠山长一人断然无法完成,故而需要学长参与课试管理。

二、学长制的具体程式与职责

从吴兰修等人的生平履历可见,他们在广东、海南、福建等地或仕、或官、或学,在当地不仅学术声名远播,又熟知本地政务民风。可见阮元在考虑学长人选时,不仅基于当地“经学不兴”的学术境况,也有向学长咨询政务的需要,故而学长兼有顾问角色。这与阮元当时在广东所处的社会现状密不可分。

“道光元年,兼署粤海关监督。洋船夹带鸦片烟,劾褫行商顶带。二年,英吉利护货兵船泊伶丁外洋,与民斗,互有伤毙,严饬交犯,英人扬言罢市归国,即停其贸易。”^{[4]1424}。当时,广东鸦片流毒,泛滥成灾。阮元作为地方执政疆臣,面临烟毒横行,必会多方查寻,最为便捷之处,莫过于求教当地学人。故而,八学长在监理学海堂职事的同时,定然参与阮元幕府,为其施政参详献策。其实早在战国时期,稷下学宫各派学者就为齐国统一中国提供资政议政的咨询服务,学海堂的八学长亦无出其右,因为中国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负“乡评”之高者,足以说明此人在当地早已声名远播,威望甚大,选择“乡评”高的学者担任学长,于书院、于地方治理均百利而无一害。“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学长作为教学与管理人员,必须品行高洁,如此才能尽职尽责,有始有终。“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16]以“品行”为先,而后审视其才能是否胜任人师职责,这并非重德轻才,而是出于德才兼具考虑。由此一来,八学长无论是参政议政,还是杏坛执教,弦歌不绝,均能以道义为重,是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师。

(一)季课考察

学海堂以季课考察学生,每年举行四次大型考试,这是阶段性的课试,主要用于考察生徒的阶段学习情况,以便对后续学习进行指导。季课每次由学

长出题,包括经文题、文题、诗题三类,并于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将试题备好。起初阮元规定在学海堂中由两位学长出题,一季一换以均劳逸。学长出好试题之后,将其贴在学长寓所周围以及街市,在试卷上标明具体交卷地址和交卷时间。这主要是由于学海堂草创之际,书院附属于广东城西文澜书院拥挤之处,场地局促不堪。广布试题,一方面可以让广东生徒更广泛地参与考核,另一方面对生徒既有学业上的益处,对于答题优异者更有经济上的资助。考核结束之后,学长根据其答题优劣,评定等第,给予膏火。后来,阮元规定在学海堂中让八位学长轮换出题,由于八学长个人治学趣旨迥异,难免有分歧。故而,卢坤督粤后,规定八学长商议出题,以期尽善尽美,并且总督、巡抚、学政三大宪亲自到堂考核学生。学长奉三大宪之意出题,题毕将其呈现宪府,由官府定夺。但是,官府对学长所出试题并未严加限制,只是从中择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学海堂、学长以及生徒在学术上的自主性。^①根据学海堂同治七年(1868年)冬试课题可知,考试内容涉及经学、史学、诗学,共八道题。其中,经学两道题,其一是“《礼记》郑读考:郑氏注《礼记》间有改字,然皆有所承受,如《檀弓·子显》引卢氏:古者名字相配,‘显’当作‘鞫’,注其慎也。云慎当为引,礼家读然是其证也。其他会通声音文字之原而审定之者,最为精核,试评考而疏证之”;其二是“《公羊传注》引汉律考:何邵公解《公羊传》,多引汉律以证其说,又不明言律而通其意者,如桓十三年传注云:自败当坐。文二年传注云:漏言当坐之类,试证以今律详考而发明之”。史学两道题,其一是“《宋史·孙奭传》书后:孙宣公在北宋称为大儒,而《宋元学案》不载,宜读其传而论之”;其二是拟重修粤秀山文澜阁碑记(骈体)。诗学四道题,其一是“梅田赋(古体):萝冈洞以种梅为业,花时村原弥望,阡陌尽缟,署曰梅田,盖赋之”;其二是“岭外游仙诗七首,拟郭景纯《游仙》即次原韵”;其三是“火轮船行(七古)”;其四是“行庵杂咏八首(七律):瘦瓢,赤藤滇杖,笠,屐,尘尾,铜瓶,英石研山,盆鱼”。^{[14]77}

(二)指导生徒学术修为

卢坤令学长在学海堂荐举立志专注经史实学、不求闻达、文如其人,品行端正无暇的生徒,诸生“有喜为浮艳诲淫之词,庸庸举列;其曾攻刀笔者,亦勿列入。至鸦片烟酒干例禁,凡在仕林,凉俱自爱,万一有犯此者,亦勿列入”^{[18]18}。学长对肄业生徒要求甚严,不仅要有安心治学的修养,而且必须品格高

尚、洁身自好、不慕官场。但是,审视学海堂首任八位学长所举生徒可发现,有10名专课肄业生科名在身,包括“陈澧(举人)、张翮(举人)、吴文起(副贡)、朱次琦(附生)、李能定(附生,已于乡试中式)、侯度(附生,已于乡试中式)、吴俦(廪生)、潘继李(已补廪生)、金锡龄(已于附生应乡试中式)、许玉彬”^{[17]69}。功名在身,意味着生徒的学业修为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科举考试有帖经、墨艺、策论等固定程式,内容以四书五经、诸子经典为主。它是对通识教育进行考察的一种方式,目的在于考察应试者是否具有广博的知识储备,能否适应拜官治民的需要,但对生徒增进自身学术修为的功效不明显。生徒择师而从,向学长请教指导,可以使其学术宜加精深,这对改变以科举为目的的功利性治学倾向,对发展实学大有裨益。学海堂一般会要求肄业生先在《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等书中,自择一书学习,学成后由学长对其所学内容进行检查,考核学生对知识理解是否有偏差。肄业生根据个人学习情况的不同,可以先读句读,亦可评论校订、摘录精华,或可著述己论、创作发明。此外,为防止生徒心浮气躁,学长会给肄业生每人一个学习“日程簿”,相当于学习进度计划,详细记录其当日所学功课。肄业生每日填注日程簿,不仅有助于安排其每日学习进程,而且便于学长对其学业优劣进行指导评价。广东巡抚郭嵩焘规定肄业诸生对所读之书要用需要用红笔进行标注,夹批或眉批,批注必须工整有序,不得凌乱。由于清末学海堂屡遭兵祸,仕子难免心有余悸,不能潜心修学,此举意在督促肄业生勿为外界世变纷扰所惑,致力学术。

(三)举行雅集活动

儒家教育认为独学则无友,孤陋则寡闻,师生之间群体性交流可以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改变狭隘的见解,故此学海堂十分重视集体交流。学海堂秉承传统,学长与生徒都重视课外集体学习活动——雅集。举行雅集,不仅可以舒缓生徒的身心,也还可增进其对本学堂历史渊源的体认,永记学海堂以实学为本的传统,继承学堂在闲暇休息之时,仍旧保持孜孜不倦求学的风尚。雅集活动学长和生徒齐同参加,活动内容丰富,包括祭祀、郊游、以文会友等。例

^① 试题体现了阮元“专事实学”的风格,可参考宋巧燕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两书院的文学教育研究》一书附录的学海堂同治七年、八年、九年的官、师课题。

如:每年正月二十日是阮元祭日,师生于学海堂中的阮太傅祠祭祀阮元,学海堂师生齐聚祠堂,瞻仰阮元画像,牢记阮元对学海堂的期望。参加祭祀的不仅有学海堂师生,亦有其他宾客,主要是阮元门下弟子以及故旧好友。春季课考结束之后,学海堂举行郊游活动。盛夏天干物燥,师生破晓登上,在山上读书至晚,并且彼此讨论交流研究心得,相互启发。七月五日“生朝节”,学海堂师生志同道合者约定时间,在祠堂行“释菜礼”祭拜孔子。中秋前后“相约为坐月之游……不及俗事,只谈风月也。有坐论者,有行吟者,随意所如”^{[17]95}。重阳寒食节,“游者至,同人秋集,不必依期……展宋玉之赋,诵明泉之诗;不出户庭,携壶翠微,惟此堂为然”^{[17]96}。冬至将近,本年度学习日程即将结束,师生携手登学海堂山亭,登高远望,彼此抒感言志,分享学术见解。这些期会大都在每季课试结束之后举行,这也暗合儒家“藏息相辅”的育人之法。雅集是融趣味性、知识及道统性于一体的群体性活动,学长与生徒同游同行,一起焚香论茶,谈经说道,怡然同乐,突破了旧时书院学规对生徒的拘束。

(四)综理书院事务

书院事务繁多,山长分身乏术,难保各项事宜井井有条,而八学长分工协作,可提高书院管理水平。学海堂作为实体教育机构,学长身兼两职,即“负责书院行政与教学事宜”^[18]。书院事务涉及学长薪俸管理、出版生徒课业佳作、祭祀、奖惩、藏书、书院学田租金管理、乡绅宦达捐赠、佣人管理、书院建设等,这些均由八学长协力公办。阮元去世之后,学海堂启秀山房奉祀其神牌,供师生祭拜。学海堂每季课试结束之后,学长根据生徒课业等第发放膏火。而且,学长会从生徒课卷之中选取若干优秀作品,整理成册,刊刻出版。“道光四年秋九月,阮公因缙城垣来相版筑……爱启堂基于此,而命学博吴兰修、赵均董其役。”^[19]学长赵均擅长土木工程营造事务,阮元在学海堂书院选址、建造房舍与物料选购,均交付赵均处理。

(五)参与教学

阮元说:“学长责任与山长无异,惟此课即劝通经,兼该众体,非可独理。”^{[17]26}“学长与山长无异”是指学长与山长一样担负书院教学与行政职责。传统书院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沦为科举制附庸,官学化日趋严重,而且多数书院平时所习不外乎科场墨文,陈陈相因,毫无新意,内容也相对狭隘。山长一人足以胜任教学职责,但是学海堂以考据学、朴学为治学趣

旨,内容涉及经、史、子、集,涵盖音训、名物、器物,断非山长一人能担之。在学长制下,学长术有专攻,在教学活动中各用学术所长。阮元曾提出文笔理论,认为用韵排比对偶者才能称为文章;而无韵,无排比,无对偶者只能称为笔记、随笔、杂感。学海堂学长在教学内容上同样秉持了阮元这一理论,特别是在文学教学方面,侧重于诗、词、文、赋等内容,形式上讲究格律。谭莹就是因为善长写骈体文,工诗赋,被阮元聘为学长,教授学生。卢坤督粤之后,为进一步使学长在教学上能够一如既往恪守传承古学的风尚,特札喻学长“期为有用之文。赋,或拟古赋,或出新题,据用汉魏六朝人诸题……均应遵照旧章,以劝古学”^{[17]4}。并且,从同治七年(1868年)学海堂冬季课试题目可知,学长的教学内容具有崇古之风。在教学方法上,学海堂除了课堂教学,还经常举行雅集活动,激发学生创作灵感。学长与诸生在郊游观赏之中,相互讨论,彼此启发,创作出许多优秀诗歌作品。学长在教学中也重视学生自学,让学生根据学术兴趣选择自己擅长的学科门类加以研究。学生自学不仅体现了学长对诸生因材施教,而且也体现了对传统山长独霸讲习、高高在上的权威的消解,有助于提升诸生独立的学术探究能力。此外,学长采用“讲座制”讲学,定期举行专题学术活动。“学海堂历来学长有金纪堂、陈兰甫、黎大椿、陈梅坪、梁禹生诸先生,每月讲学两次。”^{[20]20}讲座制可以让生徒了解学术领域最新发展,增长其见闻。“学海堂聘请学长多名,由德才兼备的学者或高材生担任,负责教学和指导学生研究学问。陈澧担任学海堂学长达27年之久。他对莞人士请益者,随问随答,无不惬其意而去。”^[21]

三、学海堂学长制的影响

(一)学长制促进教育模式地域流转

生徒来源广泛,决定了学海堂肄业生具有多向维度的辐射性。生徒在学长的指导下,从书院走向四面八方,把书院注重经古训词的教育模式向各地传播,促进了教育模式的地域流转。“学海堂的学长和生徒共有四十人次执教过二十三所书院,地域分布颇为广泛,涉及广东诸多地区:南海、香山、南雄、东莞、广州、番禺……还有广西的桂林。更有甚者,远至武汉的两湖书院,开封的大梁书院。”^{[22]132-133}比如,学长陈澧就任菊坡经舍山长后,要求“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23],革新教学模式。学海堂每年举行四次大型季课考试,陈澧仿学海堂制,增加

督课次数,每年达三十课。为了力推实学,陈澧让菊坡经舍学生在经、史、子、集中任选自己感兴趣的门类加以研修,这与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制度相似。同治九年(1870年),广州菊坡精舍仿学海堂事例,以经学、史学、诗赋考课学生,使学生各尽所长,以此为学术根底。学海堂肄业生冯树勋,于1855年任江苏南汇县知县,建立芸香草堂,仿学海堂课式,每月以诗赋经史课式学生。天津问津书院又称“北学海堂书院”,得益于直隶学政钱陈群受将学海堂注重经学的教育模式在问津书院实行。学长制下的学海堂培育了许多经学人才,不仅改变了岭南士子束书不观、空疏程朱理学心学的积弊,向实学转变,更将这种教育模式向北方推进。

(二) 学长制推动学术研究

学海堂的学长不仅指导生徒研习课业,而且在郊游之中师生共同讨论启迪,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如《皇清经解》《学海堂全集》《学海堂课艺》等。《皇清经解》初名《清经解》,该书是阮元与学海堂八学长以及书院诸生在道光初年,收集乾嘉学派经学注解名著,包括顾炎武、全祖望等人的学术著作,内容遍及文字、音律、地理、仪礼、经学、历史等,加以校刊,至道光九年辑录刊刻结束,全书共收录七十三家学者学术著作,共计一千四百卷。《学海堂全集》收录优秀生徒课业成果,共四集,二十八卷,达七百零一篇,包括诗歌、词曲、文赋、骈文、颂赞等。“这些书籍,既是学术研究成果,又是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了书院教学和研究活动的开展。”^[24]²⁷⁴特别是《皇清经解》对经书注解汇编,不仅改变了以往传注散落于各书之中不便学习者查询的弊病,而且也是对不同学派经注的一次梳理与整合,反映了学长与生徒以学海堂为载体,对传统经学发展的总结,暗合了清末文化向集大成方向迈进的趋势。嘉庆、道光年间,广东财茂民殷,文人墨客逐渐取法学海堂治学门径,专攻经史典章,诸家学者辨无虚日。学海堂专课生吴俦著《春秋公羊札记》二卷,学海堂主讲钱仪吉称赞有加。学海堂学长陈澧的嫡传弟子廖廷相、桂文灿更是学术成就斐然。廖廷相早年就读学海堂,后又任学海堂学长,著有《三礼表》一书和两卷《粤东水道分合表》。同治元年,桂文灿进京,向同治帝送呈《经学丛书》,帝赞誉“所呈各种考据,均尚详明……诸经说多有纠正,荟萃众家,确有依据,具见潜心研究之功”。^[25]从1826年至1908年,学海堂先后聘任赵均、曾钊、侯康、廖廷相、张维屏等五十五人为学长。从学海堂毕业的学生,

有专著问世者达三百多人,著作近几千种。这些学长在教学之余,同时也从事学术研究。例如,张维屏就任学海堂学长之后,在闲暇之余,将当朝诗歌批评会编撰成大型《国朝诗人征略》,共计六十卷。^①

(三) 学长制对维新变法之贡献

阮元虽然为西方科技工作者立过《畴人传》,但是他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感,并未将近代科技知识纳入书院之中。因而,学海堂中学长和生徒埋首故纸堆,研习内容仅限于经学考据,不问世事,与当时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崇尚西学,寻求经国济世之术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门户洞开,西学涌入,在外界武力干涉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阶段。面对国势衰退的形势,士大夫阶层尝试“师夷长技以制夷”器物层次的改革,出现过所谓的“同光中兴”。但是,甲午战争后,改革彻底失败。作为学长陈澧的嫡传弟子,梁启超称:“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亦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学海堂,而间日请于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26]作为学海堂的佼佼者、科举考试的胜出者,梁启超“舍弃旧学”并非是说“学长制”已成窠臼,相反“学长制”具有高效的教学与管理功用,颇受后继者青睐。梁启超离开学海堂后协助康有为办理“万木草堂”,出任学长。“教学内容虽沿用了义理、考据、经世、和文字等传统提法,但包括西方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外国文字、政治原理学……,称为酝酿、研究、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场所,也造就了一大批维新人才,梁启超即是典型代表。”^[20]³³⁶万木草堂在草创之际,缺乏精通西方宪政的师资力量,康有为在梁启超与陈千秋等“十大学长”的协助下编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大同书》等书,使万木草堂在短短三年之内,学生人数扩充到近千人,并迅速传播西方宪政思潮,扩大了维新变法的舆论影响。

(四) 学长制走进近代大学

“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教授为议员,而大学总长为议长。凡各科废置规制变更,皆公议而后定。”^[27]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主张在京师大学

① 李国钧在《岳麓书院通讯》1983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清代考据学派的最高学府》中,论述了学海堂学长人数以及毕业生著作数量。

堂仿照日本程例,设置评议会作为权力机构,各科学长不仅身兼教务之任,而且负有监察之责。但是,成立后的京师大学堂并未成立“评议会”,而是以各科“监督”代替“学长”,其教学管理也未汲取“学长制”的民主色彩,而是倾向于集权与专断。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校长,各科设学长,代替总监督及各科监督。”^[28]此时的学长制更倾向于肃清封建管理体制,转向民主化。辛亥革命之后,严复由总监督改任北京大学校长,并聘任叶可梁为农科学长、吴乃琛为商科学长、胡仁源为工科学长、王世澂为法科学长、夏元瑛为理科学长。严复之所以聘任这些人为各科学长,是因为其认为“各科为教育最高之级,责任至为繁重,非得学望素孚之人相助为理,难期实效。该学长等学有专长,并富经验,所任各科事务,办理井井有条。”^[29]当然,这些学长不论是学术能力还是大学管理都是可圈可点的。其中,夏元瑛是我国第一位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者,开创了中国物理学教育史先河。学长胡仁源后担任北大校长,聘请顾颉刚等旧学深厚的学者来北大任教,并且不断对北京大学教育教学进行改革。胡仁源对北京大学的革新,为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继续改革,奠定了基础。1917年,蔡元培聘任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者将《新青年》从上海带到北京大学,《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文科曾经是北京大学最为保守的学科,由陈独秀任其学长无疑是蔡元培对其陈腐学风进行的革新。从某种程度上讲,此时的学长制具有“政治变革”的媒介功用。

四、结论与启示

学长制注重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学提高自我学养,“重视知识的传授和智能的开发,侧重学生的自我修养和大师的榜样作用”。^[30]学长制的特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每位学长学有专攻,也即是学长在治学领域有不同的倾向,有助于学生获得多元化知识。其二,学长指导学生,也即是学长侧重于对学生学业进行高屋建瓴式解惑答疑,着重对学生进行治学方法指导,而非面面俱到,这在学海堂专课肄业生中有很好体现。其三,学长与学生共同致力学术研究,学海堂很多学术成果都是师生合作产生的。其四,学海堂师生不事科举,不论学生在学海堂求学抑或学长在学海堂授课,均是出于发展“实学”的学术动机,而非为求取功名利禄。其五,学长制发挥“双主体”的作用。在教学上,八学

长协作授课,发挥学长在教学生的主导作用;学生根据学术兴趣,自选学科门类,择书专研,遇到疑问向学长请教,拓展学生学习的能动性。

学长制对当前研究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学海堂就读的学生具备深厚学识,之所以在学海堂学习,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将学术修养更加精进。研究生教育也是如此,相比本科教育而言,研究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已经积累相应的学科知识,但是,这些知识相对较为宽泛,也即是宽而不精。因此,研究生导师之间应加强合作,侧重于对研究生进行研究范式、研究技能的指导,使研究生能够掌握规范的科研方法。其二,学海堂学生在学长的指导下自主学习,这种学习是建立在各个学生的学术兴趣研究基础之上。导师在指导研究生开展读书研讨会或学术研究沙龙时,应引导研究生定位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帮助研究生把握学术研究前沿,找准研究方向,提升研究生学术兴趣。其三,学海堂师生共同进行学术探讨。因此,应积极引导研究生参与到导师研究课题之中。但是,并非每个导师都有国家级(省级)立项课题,为了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大学可以为研究生专门设立校级科研项目,训练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其四,学海堂师生的学术动机无功利化倾向。因此,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也不能为了获得眼前各种物质与名誉奖励,而是为了科学的求真求美。

参考文献:

- [1] 吴曾. 能改斋漫录:卷十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0:377.
- [2] 翁筱曼.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晚清学海堂文学教学[J]. 学术研究, 2016(8):170-174.
- [3] 於梅舫. 科考与经解:诂经精舍、学海堂的设置与运行[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6):76-89.
- [4] 董铁柱. 阮元创办学海堂书院之因探析[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3):93-96.
- [5] 雍正. 选授白鹿洞书院掌教事宜谕[G]//陈嘉谷,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856.
- [6] 王昶. 天下书院总志序[G]//陈嘉谷,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1859.
- [7] 赵尔巽. 清史稿·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8] 乾隆. 慎选山长谕[G]//陈嘉谷,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858.
- [9] 阮元. 学海堂章程[G]//陈嘉谷,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1629.
- [10] 赵所生, 薛正兴. 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G].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 [11]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4: 485.
- [12] 阮元. 学海堂章程[G]//陈嘉谷,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 中册.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1406.
- [13] 朱琳. 谈谈广州学海堂的首任八位学长[J]. 今日南国, 2008(12): 167.
- [14] 宋巧燕. 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两书院的文学教育研究[M]. 济南: 齐鲁出版社, 2012.
- [15] 翁心存. 学海堂丁亥课士录[Z]. 北京: 国家图书馆, 1985.
- [16]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14.
- [17] 林伯桐. 学海堂志[M]. 台湾: 台北广文书局, 1971.
- [18] 季啸风. 中国书院词典[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710.
- [19] 古公愚. 学海堂述略[G]//中国书院史资料: 中册.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1405.
- [20] 丁文江, 赵丰田. 梁任公先生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12.
- [21] 罗欢. 略论陈澧教育思想[J]. 教育导刊, 2017(3): 87-91.
- [22] 王建梁. 清代书院与汉学的互动研究[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9: 132-133.
- [23] 陈澧. 东塾集: 第二卷[M]. 菊坡精舍刻本. 1892(光绪十八年).
- [24] 孙培青. 中国教育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 [25] 刘玉才. 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37.
- [26]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3.
- [27] 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奏陈所拟京师大学堂办法折[G]//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0.
- [28] 萧超然. 北京大学校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45.
- [29] 尚小明. 民元北大校长严复去职内幕[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3(2): 108-131.
- [30] 程禹文. 阮元的办学特色[J]. 教育评论, 1986(6): 58-59.

(责任编辑: 陈丽琼)